門外門內看

儀明費 ⊙

懷念黃貽鈞先生

香港樂迷認識黃貽鈞或許只知道他是樂曲《花好月圓》的作者，但他不僅是中國一位傑出的指揮家，而且對上海交響樂團的成長有卓越的貢獻。

黃貽鈞先生去世的消息令我震驚，無限婉惜地憶起了以往。

中國著名指揮家黃貽鈞（1915－1995）曾於一九八四年應邀來香港，擔任「泛亞交響樂團」的客席指揮，也以團長和名譽指揮，兩度隨上海交響樂團到香港演出，又曾爲香港音統處夏令音樂營出任青年交響樂隊的訓練導師等等。香港樂迷對這位中等身材、彬彬有禮，原籍蘇州的黃貽鈞先生還不夠熟悉，也許只知道他是樂曲《花好月圓》的作者，但是在中國大陸，黃貽鈞不僅是中國知名度極高的傑出指揮家，除了推廣交響音樂、培育樂隊專業人才以外，他對上海交響樂團的成長，尤其有特別卓越的貢獻。

黃貽鈞早年在上海音專主修小號，畢業後加入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改吹圓號。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前身爲成立於一八七九年之上海公共樂隊，一九〇七年擴大爲管弦樂團，一九一九年由意大利籍著名音樂家帕契接任指揮，他從歐洲聘請了很多樂師，其中包括後於一九四七年來香港，擔任早期香港中英交響樂團首任指揮的米蘭音樂院高才生富華（A. Foa），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到一九五五年，樂團已全部爲中國籍的音樂家所組成，黃貽鈞就是「上海交響樂團的第一任指揮。黃貽鈞的指揮手法清晰精確、富於樂感，他對音樂的態度是認眞而一絲不苟的，到現任指揮陳燮陽接手之前，在經濟、物質條件都極端困難和缺乏的情況之下，黃貽鈞數十年如一日，提攜發掘青年指揮人才，啓蒙推動中國的交響音樂事業，譬如由他一手建立和訓練的上海芭蕾學校樂隊，和無數中國交響樂的新創作，都在黃貽鈞的指揮棒下奏出扣人心弦的難忘旋律。

黃貽鈞先生和先父費穆先生有相當長遠時間的合作，父親幾部具有代表性的電影《天倫》（1935）、《孔夫子》（1940）、《小城之春》（1948）都由他配樂。記得當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四十年代初的上海正籠罩在黑暗之下，父親拒絕爲日人控制的電影公司拍片，毅然棄影投劇，創辦「上海藝術劇團」，在卡爾登戲院（現改名長江劇場）排演話劇，當時上演的有《楊貴妃》（1941）、《梅花夢》（1941）、《秋海棠》（1941）、《清宮怨》（1941）、《浮生六記》（1942）、《紅塵》（1942）等。話劇的演出同時採用交響樂隊現場配樂，不只有開場的序曲、換景的間奏曲，更務求達到戲在樂中、樂與戲平行的效果，音樂此時已不是伴奏的地位，它是戲劇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份了。年青的黃貽鈞就是「上海藝術劇團」交響樂團的作曲和指揮，他的樂隊成員也都是年青人，包括現在中國著名的音樂家、指揮家李德倫、秦鵬章、黃飛立、陳傳熙、韓中傑等，父親吩咐我們要稱呼他們「叔叔」，其中黃貽鈞叔叔、秦鵬章叔叔，更是我們家裡的常客，每逢劇場沒有演出，他們會在一起談天說地，談音樂、討論戲劇，甚至國家大事，直到深夜。

離家廿五載，八十年代初，從香港回上海探親，見到了白髮的媽媽，也看到了兩鬢斑白、仍然說得一口道地蘇州話的黃貽鈞叔叔。據說文革期間，由於家庭成分不好，思想又不夠進步的理由，黃貽鈞被剝奪和取消了他的音樂家身份和指揮資格，罰他在上海藝術劇場（即前之蘭心戲院）門口看守自行車；黃叔叔說這使他總會想起往年「卡爾登」時代，夜場散戲後，經常和秦叔叔陪伴父親一起騎自行車回家的情景，但是他更希望有那一位好心人走過，可以請他抽一枝香煙，靠發自煙頭那絲暗淡的火光取暖，也藉此能再繼續遐想已逝歲月中的美好時光。

一九九三年春，黃貽鈞因腸胃之疾住院，稍後脊椎軟化萎縮，除了不便站立之外，據說腹部動脈又發現有腫瘤，老人的身體開始日益衰弱。我在九五年五月應邀到上海音樂學院講學，五月廿四日晨去醫院探訪黃叔叔，他正戴了耳機聽音樂，病床旁邊堆滿了書報雜誌，我覺得他的臉色比前幾次去看他的時候更好。他問我許多有關香港九七回歸祖國的問題，不過，從言談中我知道他最放不下心的仍然是上海交響樂團和對家人的思念。我起身告辭，黃叔叔堅持要護士攙他起身送我，眼看他舉步如此的艱難苦痛，如何忍心讓他多走的時候更好。我說：「你保重！」……當我要轉彎進入電梯之前回頭再望的時候，黃叔叔還倚靠在門邊，向我緩緩揮手。

一九九五年十月十日清晨，上海長途電話傳來「黃貽鈞先生今晨去世」的噩訊，我禁不住熱淚滿眶。是的，雖然黃貽鈞先生在祖國廣闊的音樂園地中所留下的足印永不會淡磨，但又那能抑止永遠再也見不到他的這份悲傷和失落。